

非洲文学研究的新建设

——评《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

杜志卿

摘要：魏丽明等著《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是近年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对东方（亚非）文学学科发展史和非洲多种语言文学史进行了宏观梳理，也提供了不同国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与中非文学交流史料，在一个更为宽阔的阅读平台上，让人欣赏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的绚烂多姿。

关键词：非洲文学 《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 学科建设

2021年，非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坛最亮丽的风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斩获布克奖。他们的获奖再次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引发了一股不小的研究热潮。目前，非洲文学已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显学”，时有相关的学术成果发表或出版，成绩显著。成绩应该肯定，但绝不应盲目乐观，以为我们的研究已经赶上国外学界了。其实，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国内大多数高校还没有把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体系中，有很多工作还在路上。正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的“绪论”中指出，“国内非洲文学与文化学科长期以来的缺失导致专门人才匮乏，掌握非洲本土语言和深入了解非洲文化的学者不多，因此该领域也成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尼日利亚英语小说的互文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YJA752019。

国内亟待建设的学术领域之一”^①。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重视非洲文学研究的高校之一。1998年，该校创建非洲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年举办学术活动，并有定期出版的辑刊《中国非洲研究评论》。^②2009年，该校外国语学院成立亚非系，并开始招收非洲文学与文化方向的研究生；2022年该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生。多年来，该校外国语学院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曾先后聘请多位国外非洲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如拜尔顿·杰伊福（Biodun Jeyifo）、费米·奥索菲桑（Femi Osofisan）、弛马·阿尼亚戴克（Chima Anyadike）为非洲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开设相关重要课程。2014年5月初，在北京大学隆重举办的中国首届“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是我国非洲文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来自英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加纳以及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就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相关议题展开热烈的研讨。此后不久，国内多所高校相继举办非洲文学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比如，2016年5月，浙江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非洲文学研究高端论坛”；201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讨会”。这些专题的学术会议积极推动了国内的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

非洲有一句谚语：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能走得更远。魏丽明等学者所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2022）是北京大学非洲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结晶，也是该校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团队多年来潜心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的主体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收录9篇文章，其主体内容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语言背景的文学史的梳理，包括阿姆哈拉语文学发展史、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史、豪萨语文学发展史、葡萄牙语文学发展史、法语文学发展史，

① 魏丽明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北京：线装书局，2022年，第29页。

② 详见李安山、蒋晖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非洲文学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页。

兼论西非阿拉伯语文学的思想和文学特征、撒哈拉以南非洲科幻文学及现代主义书写。下篇包括12篇文章，其主体内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所涉及的重要作家包括南非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尼日利亚作家费米·奥索菲桑、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 Adichie）、本·奥克里（Ben Okri）和约翰·塔非达（John Tafida）、津巴布韦作家齐齐·丹噶莱姆布噶（Tsitsi Dangarembga）、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作家夏菲·亚当姆·夏菲（Shafi Adam Shafi）和夏班·罗伯特（Shaaban Robert）、科特迪瓦作家贝尔纳·达迪耶（Bernard Dadié）、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昂哥（Ngugi wa Thiong'o）、安哥拉葡萄牙语作家曼努埃尔·鲁伊（Mannuel Rui）等。除了主体内容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一书还有内容丰富的绪论和附录，内容涉及东方文学尤其是非洲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的发展史，并特别介绍了季羨林先生有关东方（亚非）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实践，其中可见我国老一辈学者对于东方（亚非）文学研究的殷切期待。附录部分有两篇文章：《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的书写——以文学史著述为个案的研究》。前者梳理了1979—2009年间国内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趋势；后者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的东方文学史教材或著作进行评述，探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在东方文学史书写中被忽略的原因。从该著作的内容编排来看，作者的写作意图十分明确，即立足于非洲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多方位展示北京大学亚非文学研究团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此书的出版说明，非洲文学学科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了，其研究前景未来可期。

该书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关键性术语的辨析和使用得当。仅以绪论中所界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为例。该著作没有使用“黑非洲文学”一词。学界常把撒哈拉沙漠中部以南非洲广大地区称为“黑非洲”，意为“黑种人

的故乡”，以区别大沙漠以北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居住区。“黑非洲”是殖民时期较为流行的叫法，是以人种和肤色来确定民族身份，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其内涵难免带有种族歧视的嫌疑，类似于“黑人（negro）”一词在美国的使用。该著作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一词，说明作者的意识与时俱进，是站在“文化相对主义”^①和文明互鉴的角度来展开学术研究的。正如季羨林先生在“总序”中指出，“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②。

二是重视本土语言文学的研究。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非洲很多国家把殖民时期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而那些享有国际声誉的非洲作家绝大多数都用欧洲语言进行创作。结果是，不少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家作品长期不为人所知。目前，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较重视用西方殖民语言创作的文学，而对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重视不足，许多非洲本土作家作品还没有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可能的原因是后者的研究受限于研究者的外语背景。“用非洲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文学宝库。”^③《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一书用了较大的篇幅对撒哈拉以南一些重要本土语言文学史（如阿姆哈拉语文学发展史、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史、豪萨语文学发展史）进行梳理，同时还对一些本土语言作家作品（如斯瓦希里语作家夏菲·亚当姆·夏菲的《苦力》、豪萨语作家约翰·塔非达的《身体会告诉你》）进行研究。这些内容对今后国内非洲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作用。我们把“阿姆哈拉语文学”“斯瓦希里语文学”“豪萨语文学”作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论文数据库里进行搜索，所能查到的文献可谓

① 乐黛云先生对“文化相对主义”有精到的论述，详见《文化相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第61—71页。

② 魏丽明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第11页。

③ 黄晖：《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6—152页。

凤毛麟角。尽管大多数非洲作家是用西方殖民者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但他们很难不受本土传统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有些作家如肯尼亚的恩古吉甚至尝试双语创作，以彰显其作为非洲作家的身份感。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唯有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有所了解，才能更客观把握非洲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创作特色。

三是重视戏剧作品的研究。戏剧是现代非洲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关注较多是非洲小说家的创作，对剧作家创作的研究十分有限。虽然我们对非洲戏剧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绩，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剧作家索因卡和南非剧作家富加德的作品上。《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一书所收录的3篇非洲戏剧专题研究论文有2篇特别值得一提，即赵聪的《文化冲突与政治关怀：论费米·奥索菲桑戏剧创作的文化品格》和沈玉婵的《贝尔纳·达迪耶〈托戈-格尼尼先生〉的戏剧风格》，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无疑能拓宽我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戏剧的认识和研究。在前一篇文章中，赵聪以奥索菲桑的剧本为据，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对奥氏作品中本土与西方、继承与创新的冲突进行分析，较好地把握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及艺术特色。在后一篇文章中，沈玉婵以时间为切入点，考察科特迪瓦著名剧作家贝尔纳达迪耶的重要作品《托戈-格尼尼先生》中表现外部时间、传递时间信息的技巧和手法，探讨达迪耶将外部时间设定在特定时代的原因。

四是作家作品的研究视角新颖，有理论思考，问题意识较强。文学批评贵在创新，研究者往往会在其研究中尽量多增添一些“新意”，或者考虑新作品，或者考虑新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收录了多篇颇具新意的好文，如程颖博士所写的《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和钟娟博士所写的《“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奇玛曼达·阿迪契写作策略探析》。国外学界十分重视非洲文学艺术实践中的“传统主义书写”。程颖博士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为对于现实危机的焦虑，另外一方面体现为对于传统的回

溯。清楚地梳理非洲文学与艺术实践中的传统主义倾向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人如何处理现代性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关系，把握传统、民族主义和现代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①。阿迪契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故事叙述的多样性，其作品“既关注尼日利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也注重描写多元文化背景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内心的挣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②。钟娟博士认为，阿迪契和阿契贝一样都反对殖民主义，都有较强的非洲本土意识，但如果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简单继承和延续，就有可能忽视其作品的丰富性。正如达瑞亚·图恩卡（Daria Tunca）指出，阿契贝不是影响阿迪契的唯一作家，如果只是从后者的作品中去寻找前者的影子，我们就有可能把阿迪契的作品读成“单一的故事”^③。

在国内已有的东方文学史著述中，研究者大多会触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学，或者“列专章介绍”，或者“在前言、序言或概述中提及”，但都无法改变一个既成的事实，即“正如东方文学相较于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中处于弱势地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学在东方文学整体中相较于亚洲文学和非洲北部地区的文学也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④。由此看来，《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无疑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努力，必定能积极推进国内非洲文学的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

① 魏丽明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378页。

③ Daria Tunca,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s Chinua Achebe’s (Unruly) Literary Daughte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dichebean’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49.4 (Winter 2018), p.115.

④ 魏丽明等：《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第466页。